

金蔷薇随笔文丛

改写圣经

邵燕祥

李辉 主编

中国华侨出版社

《圣经》拟作

——代序

原文

《约翰福音》第八章：

耶稣清早又回到殿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怎么办呢？”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打她。”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对她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拟作一

……（上略）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他们听见这话，从老到少面面相觑，他们自知都是有罪的。一个长胡子的法利赛人站出来说：“谁用石头打她，就能证明谁是没有罪的。”于是他们一个一个争先拿石头打那妇人。其中有两块石头还打在耶稣身上。

拟作二

……（上略）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摩西还吩咐我们不可作假证见陷害人。”文士说：“这妇人的肉身就是她行淫的证见。两个人的见证便是真的；我们有一群人。”那妇人说：“他们先是两人，后来是一群人要强迫我行淫。”耶稣说：“摩西还吩咐我们，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你们都忘记了么？”法利赛人说：“这妇人是有罪的，你为这妇人说话，也是有罪的。”于是众人拿石头纷纷打在妇人和耶稣的身上。

1992年5月25日

目 录

《圣经》拟作——代序	(1)
一首宋代的讽刺诗	(1)
[附] 不能否定好皇帝 (刘铁铮)	(4)
唐太宗是“一言堂”吗? (张南)	(7)
从皇帝的书画谈起	(10)
“土皇帝”也不能要	(12)
也是“可怕的现象”	(15)
[附] 也谈“可怕的现象” (吴甲丰)	(17)
咬文嚼字	(19)
从两句唐诗说起	(21)
谁接受了勋章	(23)
论“七八年再来一次”	(25)
[附] 牛棚 (巴金)	(29)
说“三不”	(31)
说“从……以来”	(34)
试谈“争鸣”	(37)

从“林彪是谁”想到的	(39)
要文明，不要野蛮	(41)
旧城·名胜·公园	(44)
说荒诞	(47)
戴在臀部的奖章	(49)
遗憾与遗恨	(51)
序《陈小川杂文选》	(53)
小议周作人	(55)
夜读随记	(58)
替鬻狗翻案	(61)
睫在眼前长不见	(64)
鸦雀篇	(67)
基础上的真话	(69)
不知……为何物	(73)
假牛黄	(76)
瓶里装的什么酒？	(78)
评杨柳元为狗吊孝事	(81)
哀沛人	(84)
说“笔杆子”	(87)
辟“龙的传人”	(89)
读报杂感	(92)
闻康有为青岛故居开放有感	(94)
家·家长·家长制	(97)
垃圾篇	(99)
胸中“数”从何处来	(102)
同志	(104)

莫作怪	(107)
寄大读者	(109)
串胡同记	(112)
和尚之喻	(115)
自信与他信	(118)
人能接受别人的教训吗?	(121)
论“看眼色”	(124)
“失落感”臆谈	(127)
送瘟神	(130)
说阵痛	(133)
清官贪官优劣论	(137)
有感于“周恩来指示过”	(140)
猫的哲学	(143)
不是恶作剧	(146)
这个与那个	(149)
文化与武化	(154)
也说雷锋塔	(156)
趣味逻辑	(159)
开会篇	(164)
政治与面貌	(167)
释“条子”	(170)
久违了, 王力先生	(172)
长话短说	(175)
忽发奇想	(178)
手是干什么的	(181)
三张邮票的一桩公案	(184)

历史不止是历史学家的事.....	(188)
回忆那时读《那时.....》.....	(191)

一首宋代的讽刺诗

淳于丹同志^①有意编选一本历代指陈时事、针砭时弊的政治诗集，我推荐了一首宋代的“谑词”——或称讽刺诗。词见《词林纪事》，引《中吴纪闻》：

徽宗即位，下诏求直言，时上书与廷试直言者俱得罪，京师有谑词云云。

当初亲下求言诏，引得都来乱道。人人招是駱宾王，并洛阳年少。

自讼监官及岳庙，都一时闷了。误人多是误人多，误了人多少。

我没有查对宋史，所谓宋徽宗下诏求直言，前前后后是怎么回事，不甚了了。但我想谑词中指的被误之人，其实乃是自误者：误在他们不懂得，皇帝老儿之所以让人讲话，显然是迫于某种需要，过几天，出于同样的或别样的需要，当然又有权不让讲话的。于是直言获罪，何足怪哉。

^① 即书画家、诗人朱丹。

封建时代的让人讲话啦、招贤纳士……，无非就是那么一回事。昏君与亡国之君固然如此，就治世的“明主”又何尝不是“一言堂”？这是封建专制主义的性质所规定的，与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不可同日而语。

有人问：我们是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不是也曾经自食其言，把大批真诚向党提出批评建议的人，加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荆冠么？是的，记忆犹新。历史已经证明这是一个违反党的原则、违反社会主义利益的贻害深远的错误。然而正是中国共产党自己起来纠正了这个错误^①。这种坚持真理的党性和光明磊落的气魄，岂是宋徽宗赵佶之流所能企及的？！

饱经忧患，大家纷纷从远近的历史找经验教训，这是好事。然而我以为，要健全的发展党内的民主生活，首要的是向几千年封建专制主义的残余影响作斗争，而断不能再象封建时代的臣民那样，只是向往“清官”和“好皇帝”，断不能以“清官”和“好皇帝”的标准，取代我们对社会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领导人的要求。我们称道魏征敢于“犯颜正谏”，自然同时称道了唐太宗肯纳直言。唐太宗李世民算是比较开明的一个，但是再开明也还是皇帝；一旦龙颜不悦，贵至宰辅重臣还不都是诚惶

^① 对于这一点，我在1989年曾经补充指出，纠正自己的错误，清还历史的欠债，是一个郑重的党对人民负责的表现，但不宜当作自豪的事情来夸耀。历史的教训是，如果致力于健全民主政治，实行法治而不是人治，并有来自各方面的民主监督，至少可以少犯错误，不犯大错误，犯了错误也可以得到及时的纠正，不致拖到二三十年后才来“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

诚恐，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何况，草芥小民尽管满心巴望的是唐太宗，可难免来的不是宋徽宗吧。

二十五史上也许有几行开言路、察民情的记载，不过封建时代的圣君贤相，只可为鉴，不足为师。我们要加强的是社会主义民主，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党内民主，我们就要翻开新的一页，写下自己的制度、规范、章程。

当然，对李世民不该抹煞，对赵佶也不必苛责。赵佶一即位就大张“求直言”的文网，只不过是从列祖列宗那儿学来的一手两手，并非他的创作。说到创作，这个亡国皇帝其实倒不乏文采，至少他的瘦金书和花鸟画还是可以传世的吧？于书于画，我全是外行，谨以质诸方家。

1979年10月28日

附：不能否定好皇帝

刘铁铮

读《百家言》栏《一首宋代的讽刺诗》，有些不同的看法。

马克思主义历来主张唯物主义，即分析问题不能脱离实际。特别是历史，更不能脱离当时的背景。该文说：“封建时代的让人讲话啦、招贤纳士啦，无非就是那么一回事，昏君与亡国之君固然如此，就是治世的‘明主’又何尝不是‘一言堂’？这是封建专制主义的性质所规定的，与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不可同日而语。”我认为把封建帝国特别是“好皇帝”的招贤纳士，说成是“就是那么一回事”，是不对的。特别是“好皇帝”，他们的主观愿望还是想把国家治理好，并不愿意国家亡在自己手里。汉文帝曾多次下令求贤良，无论贵贱，有才必用，并带头勤俭耕种，致使国家兴旺，百姓安居乐业。唐太宗把魏征视为镜子。他曾说：“魏征亡，朕亡一镜矣”。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直到今日不能不说是至理名言。正因为汉文帝的举贤，唐太宗的纳谏，才有“公私仓廩俱丰实……男耕女桑不相失”的兴盛景象。怎么能说“举贤纳

谏”就是“那么一回事呢”？这治国大道难道还能象儿戏一样可有可无吗？

另外，说到“明主”也是“一言堂”，我认为也不正确。所谓“一言堂”就是不让别人讲话，武断专横，这和听取别人意见，择优劣而论定是有本质区别的。“家有千口，主事一人”，终究要有拍板的。唐太宗的国势之所以强盛，正是由于听取了臣下的意见，做出了正确的决策才形成的。怎么能说是“一言堂”呢？相反的，凡是“一言堂”不听谏的，国家绝不会兴旺，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该文还提到：“唐太宗李世民算是比较开明的一个，但是再开明也还是皇帝”等等。这种说法不妥。倘若再过几百、几千年，我们的子孙也用类似的话来论定今天的社会，今天的人，我们能接受吗？假如拉一位唐太宗时代的人到今天来问，他也会说唐太宗好。既然唐太宗能使国家富强，百姓安生，我们“巴望”有一个现代的“唐太宗”有什么不可呢？我们不能把现在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情景去同封建时代相比。

我认为该文之所以不能服人，关键在于没有用发展的、现实的、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历史，而是借古以当今。封建时代有好人，即令是皇帝，好就是好，而不能因为是封建主义君主，就一概否定，把好坏等量齐观，那就不需要具体分析，有一顶帽子就够了。如果按他的观点推论下去，结论将是什么不言自明。

我同意该文提的“向几千年封建专制主义的残余影响作斗争”。但绝不能因“斗争”而否定历史，更不能用

“封建”“帝王”这两个词否定几千年的历代君臣。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他们是正确的，向上的，符合历史发展的，兴利除弊的，说一声好，让今人作为借鉴，又有何不可。

1980年7月10日《北京晚报》

附：唐太宗是“一言堂”吗？

张 南

《百家言》栏《一首宋代的讽刺诗》一文，提出我们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而不能寄希望于“清官”与“好皇帝”，这是很好的意见。但文中谈到“就是治世的‘明主’又何尝不是‘一言堂’？并以唐太宗为例，有可商榷之处。

唐太宗是不是“一言堂”？

在封建王朝中，对一切重大问题，皇帝一般地有最后决定权，似乎可以说唐太宗是“一言堂”。

但这些年来我们说的“一言堂”，是指一种作风，即不注意倾听别人的意见，一人说了算；听不进不同意见，一意孤行；听不得批评，老虎屁股摸不得等等。在这个意义上，就不能简单地说唐太宗是“一言堂”了。

因为唐太宗吸取了历史上一些王朝兴亡，特别是隋朝灭亡的教训，是比较注意倾听臣下意见的。旧唐书说他“从善如流，千载可称，一人而已”！当然有溢美之辞，但也不是毫无根据。这里讲几件事：

在选拔人材中，唐太宗曾经下令，有伪造历史而不坦白者处死。不久，发生了这种案件，大理少卿戴胄却按法律规定判决流放。唐太宗说：我下过命令，你今天另判一套，岂不使我失信于天下！戴胄说：法律是国家的大信，你说的话是依一时喜怒，按法律判决是忍小怒而存大信。唐太宗赞同了他的做法。

唐太宗特别宠爱儿子越王，有人说三品以上大官轻视越王，唐太宗大怒，把三品以上官员找来训斥说：隋朝诸王随意践踏官员，我不许诸儿骄横，你们日子好过，反过来看不起我儿子。我如果放纵他们，岂不会践踏你们，魏征依理直言说：三品以上公卿，皇帝都敬重，即使有小不对的地方，怎能许可越王随意侮辱他们呢！隋文帝骄纵诸子无礼不足为训。唐太宗悟过来了，说：我说的是私爱，魏征说的是国家大法。

贞观四年，唐太宗命令调一批部队修洛阳乾元殿，给事中张玄素上书说：大乱之后，国家很穷，这时大修宫殿，比隋炀帝还不如。唐太宗大怒说：你说我不如隋炀帝，比桀、纣怎么样？张玄素说：如果坚持修宫殿，结果会同样大乱。唐太宗三思后终于接受了这个意见，下令停修，并奖张玄素 200 匹绢。

从这类事看来，似以不给唐太宗戴上“一言堂”的帽子为宜。

当然，唐太宗倾听不同意见，基本限于其统治集团的核心，目的是使李氏王朝千秋万代。而且，前期比较好，后期差一些，晚年更差了，但在“一言堂”成为普遍现象的封建时代，还是有卓识远见的。

我同意邵燕祥同志“可以为鉴，不可为师”的意见，我们所要建立的应当是唐太宗的“纳谏”和一切资产阶级民主都不能比拟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载1980年7月24日《北京晚报》）

从皇帝的书画谈起

我在《一首宋代的讽刺诗》一文的结尾，提到宋徽宗赵佶的书画也许还可以传世，很快就接到热心读者的来信，提出不同意见。

关于赵佶书画的真赝，他与院体的关系，他的艺术风格对后世的影响，我相信艺术家们会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褒之者，绝无趋时阿世，以求一官半职之嫌；贬之者，也没有祸从口出，以致杀家灭门之虞；我相信，实事求是是不难的了。

历史上，有的人以文传，也有的文以人传，有的人微职卑而文得以传，有的官高位显而文竟不传。乾隆皇帝在位近六十年，功业不小，行有余力，留下御制诗两万多首，比号称“六十年间万首诗”的宋代大诗人陆游还要多产，而且可能是中国历史上个人作品保存得最完善的头号人物，这位陛下又雅好题字，勒石刊碑。所在多有，然而请问有谁能记诵他的哪怕是一句诗吗？倒是宋代一个穷文人潘大临才写了一句就被索债人打断，再也续不下去的“满城风雨近重阳”，当时脍炙人口，至今依然传诵，“满城风雨”已经成为寻常口头语了。

“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时间的长河也检验着艺术